

成長之旅： 《邦查女孩》的生命敘事

林淑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

中文摘要

「成長小說」或稱為「教育小說」，主角的成長是一場生命的學習與生命意義的追尋之旅。甘耀明《邦查女孩》鋪陳人物於社會的歷練，於集體的關係脈絡中理解生命，值得以生命教育的觀點加以詮釋。主角古阿霞面對人生的衝突、生命情境的抉擇，協助友朋走出自責的創傷，彷彿歷經通過儀式而邁向更具智慧的階段。作者以森林為台灣自然環境的象徵，透過走訪林田山林場及閱讀文獻，藉由想像及反諷，鋪陳 1970 年代中央山脈的伐木景象。小說中的人物在旅遊的過程中成長，尋找生命的存在價值；同時隱喻自然與人的相處之道，以及實踐生命的永恆意義。藉由素材編織、重組，傳達生命的價值，引發讀者的同理心。本文從旅遊動機與路線、旅行與生命敘事兩層面，探討成長小說如何詮釋追尋生命意義的主題。

關鍵詞：成長小說、甘耀明、創傷、敘事、旅行

Journey of Growth: Searching the Meanings of Life in *Pangcah Girl*

Lin, Shu-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Growing up is a journey of learning how to live and finding the meaning of life. Bildungsroman, focusing on main characters' experience in society, is a good teaching material for life education. In Gan Yao-ming's *Pangcah Girl*, the illustration of characters' enlightenment process provides an aspect to understand life in the context of collective relations. Being faced with conflicts in life, choices of life situations, and helping friends to get out of the self-blaming trauma, it seems that by passing through such rituals, the protagonist Gu A-xia is successfully marching toward a more intelligent stage. By visiting the forest farm of Morisaka and reading relevant texts,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landscape of logging in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in the 1970s and interprets the core values of growth through imagination and irony.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grow in their traveling, looking for the value of life. This fiction implies how people could get along with the nature, and expresses the eternal meaning of life practice. By braiding and reorganizing the stories, it conveys the

value of life and triggers readers' empath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eme of how th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interprets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two aspects: travel and self-grow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

Key words: bildungsroman, Gan Yao-ming, trauma, narrative, travel

成長之旅： 《邦查女孩》的生命敘事

一、前言

「成長小說」源自於德文 *Bildungsroman*，或稱為「教育小說」，主角的成長是一場生命的學習與生命意義的追尋之旅。成長小說的題材為主角在社會的歷練和成長，在社會裡找到新的定位而彰顯生命價值。英國學者威廉斯認為文學藝術是我們嘗試接近某時代「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的最佳途徑，文學是一種特殊論述方式、一種特殊的知識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不為知性框架所囿¹。成長小說不僅為文學的表現形式，更承載社會氛圍、歷史文化底蘊，閱讀成長小說亦是理解時代情感結構的方式之一²。透過對生命倫理的思考，非將生命視作得到某種目的的工具，而是使生命的本身擁有應該被尊重的價值³。真正的生命是具價值及尊嚴，擁有自主權與獨特性而呈顯其意義。成長小說為作者表達感情生命的方式，讀者透過閱讀文本中人物的跌宕與成長的意義思考生命本質，重新面對生命情境。

邦查 (Pangcah) 是花蓮阿美族自稱語，甘耀明以《邦查女孩》作為書名，安排古阿霞的旅程作為成長小說發展的主要軸線。此書不僅榮獲 2015 年文化部「台灣文學金典獎」中的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又陸續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

¹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P, 1997), p. 132.

² Abrams, M.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p. 132.

³ 游惠瑜，〈生命議題的倫理思考〉，《哲學與文化》32 卷 6 期（2005 年 9 月），頁 106。

十大好書獎、2016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紅樓夢獎決審團獎。台灣近年來為提倡長篇小說創作風氣，而規劃一系列鼓勵措施，如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頗具代表性。從2003年除遴選優秀的小說文本，並規劃全面性的管理機制，如協助洽詢出版社、座談會的敲定，及媒合相關各產業合作的可能，如改編成戲劇形式、語言翻譯等，為文學找到更多元的曝光管道，實踐另種「異業結盟」的經營模式和傳播方式⁴。甘耀明於創作《邦查女孩》的過程中，曾受邀於文化部「台灣文化光點計畫」、《文訊》的台德交流計畫，並擔任慈濟大學駐校作家，先後至德國、香港等地持續創作。此書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15年專案第二號補助，除了實體出版外，也同步發行電子版，更由劇團「末路小花」改編成兒童戲劇，有助於國內的閱讀風氣和市場行銷。此長篇小說以虛構的情節，型塑少女少年主角的性格，鋪陳人物的生命能量，為台灣當代成長小說的代表作之一。甘耀明擅長將歷史脈絡重新變化，編織成生動的敘述結構，李爽學以「千面寫手」一詞，讚揚甘耀明作品風格多元的特色⁵。他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將聽聞的故事加以轉化，鄉野傳奇成為創作的靈感來源之一。甘耀明又曾於全人中學任教，關心學生並啟發內在潛能及寫作的的能力⁶。這些教學相長的經驗，融入其成長小說的主題。回顧甘耀明小說相關的研究，學者多從後鄉土、死亡書寫、美學風格與改編歷史等視角探討其作品，並已積累一些可觀的成果⁷。專篇分析《邦查女孩》小說中生命主題意涵的論文較有限，故本論文以此小說為研究素材。

⁴ 國藝會成立於1996年，據「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提及主要對文化事業做相關的輔導、補助及獎勵，以提升閱讀風氣、藝文氛圍，更具規模推行文學活動。

⁵ 李爽學，〈推薦序—千面寫手〉，甘耀明，《神秘列車》（台北：寶瓶文化，2003年），頁9-12。

⁶ 李崇建、甘耀明，《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台北：寶瓶文化，2004年），頁16。

⁷ 如郝譽翔，〈新鄉土小說的誕生：解讀六年級小說家〉，《文訊》第230期（2004年12月），頁25-42；周芬伶，〈歷史感與再現——後鄉土小說的主體建構〉，《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像（1945-2006）》（台北：印刻，2007年），頁123-126；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2008年）；陳惠齡，〈空間圖式化的隱喻性——台灣「新鄉土」小說中的地域書寫美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2009年10月），頁129-161。薛鈞洪較關注在動植物之符號意象與功能，至於成長小說的主題意涵並未多加著墨。薛鈞洪，〈族群、性別與生態：《邦查女孩》動植物意象分析〉（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7年），頁55-96。

《邦查女孩》的場景以林場、工寮及森林為主，作者曾費心藉由訪談及蒐集資料以理解相關知識。時代背景設定於台灣戰後 1970 年代中央山脈伐木景象，故事發生的地點於林田山林場，「日文唸作摩里沙卡，日文漢字為森坂，意思是森林蒼翠的山坡。」⁸此地景為實存，位於日治時期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的伐林區，主要集中在平林車站西邊的林田山一帶，砍伐樹種主要為生長在海拔約 1800 公尺至約 2400 公尺的扁柏、紅檜、針葉樹⁹。甘耀明曾藉著 2009 年到體制外中學教書的機會登山，大背包裡裝二十五公斤物品，一個禮拜在山上自己烹煮、挖廁所。因接近山林文化的機會，改變他對大自然的認識，尤其當親身體驗腳底起水泡的時候，即醞釀撰寫關於山林的作品。又為了籌備寫作，甘耀明走訪當年的伐木人、山林消防員、開小火車的司機等，聽他們講述如何砍倒一棵大樹的事蹟。他提及田野訪談得助於花蓮林田山與木瓜山林場任職的王臣勳先生、胡煥珍先生、莊明儀先生、蔡新傳先生等人，以及得助於登山專家歐陽台先生攜引後輩攀登高山，而得以體驗台灣山林的真實情境，創作《邦查女孩》兼具知性與感性的小說。透過走訪田野及閱讀文獻資料，再以想像與書寫的技巧，觸及成長情境的議題。此部小說中的主角如何藉由旅行不斷學習與自我成長？小說如何結合旅行與生命敘事的素材？本文從旅遊動機與路線、旅行與生命敘事兩層面加以探討。

二、旅遊動機與路線

旅遊為自我認同、實踐自主權的方法，提供更親近自己、展現自己、改變自己的機會。作者刻劃小說人物於旅遊過程中展現生命力而成長的社會文化脈絡。《邦查女孩》中的古阿霞自幼受盡各種折磨，身心遭受巨大創傷，曾窩身於花蓮餐館樓梯間工作五年，因遇到帕吉魯而展開一連串旅程。本節為探討旅遊與自我成長的關聯，故以實踐募款建校的實踐之旅、提升生命能量的互助之旅兩層面，分析旅遊動機與路線，以詮釋小說中人物的體驗與實踐。

⁸ 甘耀明，《邦查女孩》（台北：寶瓶文化，2015 年），頁 34。

⁹ 山本三生編，《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日本：改造，1930 年），頁 202。

(一) 實踐募款建校的旅行路線

當古阿霞住在菊港山莊之際，眼見森林的學童每天坐流籠上下山，費時費力長途跋涉才能到達學校，於是下定決心使林場摩里沙卡小學復校。小說鋪陳她與帕吉魯揹起大木箱，帶著黃狗胖浪環島募款的情節。本文為具象呈現古阿霞與帕吉魯主要移動的路線，運用空間資訊系統（GIS），繪製如圖一：



圖一：《邦查女孩》旅行敘事圖

資料來源：以國家文化資料庫典藏台灣省林務局，「台灣省各林區轄區圖」為底圖，再加以編繪而成。

圖一以國家文化資料庫「台灣省各林區轄區圖」為底圖，再加以編繪而成。因考量此圖與小說的時代相近，且為林業相關主題，故以之為底圖。再配合小說主要情節的發展，運用衛星定位點，及 GIS 技術編繪的路線。小說以古阿霞於花蓮市的生活圈為濫觴，再細膩描繪與帕吉魯至林田山林場的生活。之後古阿霞和帕吉魯因希望拜訪吳天雄與文老師而暫離林場，一起展開到玉里的尋找之旅。得知吳天雄已至玉里療養院治療，於是到療養院探望而認識「紅字」。因不願紅字一直處在遭惡劣對待的困境，而決定前往台南找尋紅字的家人以協助他脫離療養院。本想順道拜訪轉職任教於台南的文老師，然而文老師早已因伯父的牽連受到警總軍法處監視，再加上民眾檢舉，而以叛亂罪亡於槍下。返回花蓮後，因在海星中學的禮堂辦募款會的衝突，費主教提議至七星潭海濱散步散心，並與學生化解誤會（《邦查女孩》，頁 169、184-209）。又為祝福素芳姨成功攀登聖母峰，古阿霞隨登山隊前往雪山翠池祈願。後來帕吉魯跟著二十多人參加每年的高山元旦升旗，他帶病上山，只為帶古阿霞觀七彩湖結冰的奇景。古阿霞到台北完成於珠穆朗瑪峰（聖母峰）遇難的素芳姨遺願，協助豬殃殃走出悲痛（《邦查女孩》，頁 426、532-533、573）。甘耀明藉由小說中主角的旅行歷程與記憶，型塑人物的成長經驗，分享古阿霞體悟的生命意義，與讀者建立情感連結。

作者將相關人物於台灣的移動歷程編織成故事，主要移動的路線從花蓮市→花蓮林田山林場→花蓮玉里→台南→沿海路至宜蘭蘇澳港→林田山林場→花蓮七星潭海濱→雪山翠池→七星崗伐木站、七彩湖→台北→林田山林場。《邦查女孩》以古阿霞於花蓮市生活圈為濫觴，再細膩描繪與帕吉魯展開成長之旅的歷程。小說中的主角古阿霞希望追求並掌握自己的幸福，遠離花蓮至各地旅遊體驗，後回到「摩里沙卡」林場，為了建立一所山區學校而費心費力。

古阿霞又因旅行而得以聽聞另一種生命故事，當他們一行人到七彩湖旅行，因與素芳姨聊天而得知帕吉魯的父親伊藤典裕的傳奇。作者運用日治時期人物資料，卻創造出虛構的人物伊藤典裕。描繪十六歲時「來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就讀，不愛上課，總喜歡出外採集植物與昆蟲，足跡踏遍布農族、鄒族、達悟族的生活圈，並靠自學考上台北帝國大學，走上生物學家之路，並揭開櫻

花鉤吻鮭為陸封型魚類的秘密。」(《邦查女孩》，頁 263)《邦查女孩》前半部的生平類似鹿野忠雄的傳奇，此位從小對昆蟲深感興趣，並為台灣豐富的自然生態所吸引，曾就讀台北高等學校，並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和警務課的委託進行高山調查。其著作《山、雲與蕃人》是「日治時期台灣自然寫作的經典之作，表達關懷自然環境，且對在地歷史記憶重新召喚，以及對於生態的終極價值。」¹⁰《山、雲與蕃人》以「由於高山野花綻放，我聞到高山的芬芳。」「真是一個百花競豔的高山花園！」¹¹等親身感受，字裡行間充滿珍愛台灣山林的熱情。《邦查女孩》後半部的經歷則描述另一位人物大島正滿，這位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來台灣服務。主要從事淡水魚研究，曾與喬丹博士(Dr. David Starr Jordan)確認於 1917 年發現的新種鮭魚共同發表命名¹²。甘耀明混搭鹿野忠雄及大島正滿兩位人物的生平，型塑《邦查女孩》小說中伊藤典裕另類傳奇的一生。此趟旅行不僅得知帕吉魯的身世，亦使古阿霞想起轟動國際的阿美族李光輝的故事。1944 年隨軍駐防印尼摩羅泰(Morotai)島，與部隊失去聯絡，憑著原住民的求生技巧與野宿技術獨自於叢林存活。當五十四歲返家時，妻子早已改嫁，部落面目全非，加上語言的隔閡，與族人、親人之間不知何以相處，以致他鬱鬱寡歡，絕口不提南方的事¹³。《邦查女孩》如此形容：十個國小剛畢業的男孩花半個月走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至台東鄉下拜李光輝為師，卻看到如此之景象，榮歸故鄉的李光輝成為觀光遺產，住在仿照印尼叢林的茅屋，卻穿西裝，安靜沉默，任觀光客穿梭到訪。一位講日語的觀光客拿起攝影機，戲弄李光輝說美軍來了，李光輝嚇而逃跑，「觀光客們邊按快門邊大笑。十個孩子揍

¹⁰ 高嘉勵，〈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行旅書寫——日治時期「自然」的現代知識建構與美學表現〉，《中外文學》45 卷 1 期(2016 年 3 月)，頁 119-165。

¹¹ 此書描繪冷杉林、玉山圓柏、箭竹林逐漸被各種高山植物取代，又提及植物種類，傾斜山壁上的高山野花、玉山蒿草、玉山沙參、玉山山蘿蔔等山林現象的描繪。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台北：玉山社，2000 年)，頁 252。

¹²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台灣瑰寶—櫻花鉤吻鮭的家」，〈台灣櫻花鉤吻鮭一波三折的命名過程〉，(來源：<http://life.nthu.edu.tw/~labtcs/Salmon/>，2019 年 5 月 20 日)。

¹³ 這位出生於日治台灣臺東廳境內的都歷阿美族部落(今台東縣成功鎮)，日本姓名為「中村輝夫」雖然他在原始叢林裡獨居三十年，多次受傷、染患瘧疾，都能痊癒康復；但返台後短短四年，就在 1979 年六月以肺癌病故，結束了他從史尼育唔到中村輝夫到李光輝，悲情卻也戲劇的一生。管仁健，《你不知道的台灣國軍故事》(台北：文經社，2011 年)，頁 141-142。

了起頭的觀光客，也跑掉了，一路哭回花蓮，突然一夕之間長大了。」（《邦查女孩》，頁 266）當時的媒體與政客不斷騷擾，有時要求他穿著叢林時的服裝拍照。李光輝活在現實世界中卻淪為觀光客的丑角，暗喻戰爭及戰後情境的荒謬性。這群孩子彷彿歷經成年禮，在現實情境中領悟生命的議題。

空間象徵生命存有的模式與認知，生命存有與文化價值體系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歷史即是透過具媒質性質的空間，共構成具意義性的生命網絡。當古阿霞與帕吉魯返回花蓮後，因在海星中學的禮堂辦募款會發生衝突，費主教提議至七星潭海濱散步散心，並與學生化解誤會（《邦查女孩》，頁 169、184-210）。印象空間為連接過去和現在，印象交疊，形成相互構成的記憶、追憶與氛圍¹⁴。七星潭原是七座湖的溼地，因日軍填湖闢建南埔飛行場與躲避二戰的美軍轟炸，村民被迫遷到海岸，故七星潭海灘對花蓮人而言具精神意義，為記憶與追憶交疊的印象空間。

關於空間與生命書寫的關聯，鄭文惠曾言簡意賅地分析：

空間形式與意義，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生產和被生產，在特殊的社會變動與歷史衍異中，又被重新結構和轉化。空間的生產和被生產機制實受權力的支配與操弄，空間的分類和分配，往往是社會建構中意識形態的展佈方式，烙印著權力的標記。¹⁵

小說中的林田山林場成為古阿霞等人物生命成長的所在，此空間既是生命存有的根本形式、山林文化構成的共存，也是林場開發變遷的權力運作交鋒場域。小說又提到：「一九七零年代的移工政策使得臺北成為築夢城市，人們努力追逐金錢、權力與名利的慾望。」（《邦查女孩》，頁 604）台北都會的空間權力與社會關係，共構成動態的話語實踐的辨證歷程。而玉里於戰後成為榮民療養院的地點，其形式與意義呈現意識型態及文化權力的軌跡。兩位主角於台灣各地的空間移動，彷彿成年禮的旅程。空間移動使人生命存有的開展另一種

¹⁴ 石計生，〈印象空間的涉事——以班雅明的方法論楊牧詩〉，《中外文學》31卷8期（2003年1月），頁234-252。

¹⁵ 鄭文惠，〈「空間與生命書寫」專題導言〉，《政大中文學報》第2期（2004年12月），頁1-2。

歷程，同時又呈現歷史脈絡、積澱為一種文化結構。《邦查女孩》古阿霞希望奮力使一個已廢校的小學復校，從鄉村到都會再回到花蓮，回到蘊含生命能量的原鄉。

（二）提升生命能量的互助之旅

小說情節的編織與旅行互助的相關，如小說鋪陳為祝福劉素芳成功攀登聖母峰，古阿霞隨登山隊前往雪山翠池祈願的情節。後來帕吉魯跟著二十多人參加每年的高山元旦升旗，抱病上山是為帶古阿霞觀七彩湖結冰的奇景。《邦查女孩》描述劉素芳曾利用雪攀裝備，滑向深雪淹沒的觀測站煙囪，拯救出三位堅守玉山北峰氣象觀測站不撤退的氣象員的事蹟。至於古阿霞到台北是為完成在珠穆朗瑪峰遇難的素芳姨遺願，協助豬殃殃走出悲痛（《邦查女孩》，頁 426、532-533、573）。死亡是唯一而單向的生命體驗，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師長、親人、文友開始離去，起初是緩慢的，後來逐漸變成一種不斷回返的常態，生者不得不去面對這種現象。哀悼生命不但是一種策略的選擇，更是生命在書寫的行為中面對自我或遭逢他者挑戰的不斷試煉¹⁶。豬殃殃與素芳姨同行攀登尼泊爾的珠穆朗瑪峰，天氣變壞導致素芳姨登頂後的回程，不幸因山難而逝。素芳姨透過無線電與豬殃殃通話後，平靜的離去；然而，身為同隊隊員的他無法接受素芳姨的離世，頹廢度日。他的屋內凌亂，堆著成堆的罐頭與泡麵，身上散發不知多久未洗的臭味。古阿霞為引導豬殃殃走出封閉的自我，費盡心思。因曾見帕吉魯敲擊七百齡鐵杉的心臟，於是效法以小木棒朝心臟敲下而發出像蛙鳴的聲響（《邦查女孩》，頁 659）。人的存在為活動的聲明，生命繼續發揚，和別的物體的生命互相聯繫。遵守倫理規律，人常行善，積成善德。善德為道德，乃是倫理規律的成果¹⁷。樂於助人的古阿霞，終於引出豬殃殃步出戶外並安慰：「說出來是最好的治療」，聽其訴說登山隊攻頂的過程（《邦查女孩》，頁 659-666）。藉由作者編織情境感嘆生命短暫，哀傷摯友的喪亡，以喚起讀者的

¹⁶ 蘇榕，〈死亡 | 轉生：古雷希的生命書寫〉，《英美文學評論》第 15 期（2009 年 12 月），頁 4-8。

¹⁷ 羅光，〈倫理道德和生命〉，《哲學與文化》18 卷 9 期（1991 年 9 月），頁 770-772。

共鳴而更具說服力。哀悼書寫不僅書寫死者，同時也書寫歷經悼亡經驗的自我。豬殃殃從跌入難過、悲傷等各種情緒中，藉由傾訴而撫平內心的創傷。古阿霞則透過協助豬殃殃走出傷痛，因熱衷助人而成長。

旅行書寫使人的生命開展另一種歷程，同時又呈現歷史脈絡、積澱為一種文化結構。因帕吉魯傳授森林知識、林田山林場的體驗，是古阿霞理解邦查的森林系統知識，因如此的實務經驗而成為分辨樹種的專家，亦因旅途中的學習而成長。《邦查女孩》兩位主角於台灣各地的移動，彷彿歷經成年禮的儀式，透過旅行不斷互相學習，思考自我存在的意義¹⁸。小說中的人物在旅行的歷練中成長，因接納、尊重而尋得生命存在價值。

古阿霞本寄居花蓮市，後深入花蓮縣山上海邊、台南、宜蘭、苗栗、台北，又返回林場。透過旅行情節的推展、事件的鋪陳，《邦查女孩》呈現古阿霞為籌建山林小學而持續不懈奮鬥，歷經種種轉變而對人生有所領悟，進而有所成長。雖許多善心人士捐款相助，與所需金額仍呈現杯水車薪的樣貌。古阿霞決定從花蓮到台北參加五燈獎歌唱比賽、至民歌西餐廳演唱；帕吉魯為賺更多錢協助阿霞蓋學校，而走進詛咒森林以電鋸伐木，導致發生不可挽回的悲劇。不論是敘事或旅行，都擴大視野使生命更寬廣。旅行中面對文化差異，帶回動人的生命故事，看見台灣土地上的生命印記。透過旅人生命經驗反芻的思路中，帶領讀者引發經驗層次的共感。旅行代表未知與冒險，為生命帶來更新的機會。旅行與生命中的療癒有關，須冒某種程度的風險，需要在挑戰中砥礪自己不放棄，才能到達彼岸。

三、旅行與生命敘事

甘耀明善用素材轉化於成長小說中，藉由敘事闡釋生命的價值。同時以龐雜史料與旅行事件交織，串連而成小說情節。本文以旅行與現世性主題、生命敘事策略詮釋旅行與生命敘事的意涵。

¹⁸ 朱宥勳，〈接近無限的純真：讀甘耀明《邦查女孩》〉，《聯合文學》第368期（2015年6月），頁74-75。

（一）旅行與現世性主題

後殖民理論家薩依德（Edward W. Said）格外關注像小說這樣的文化形式，提醒讀者留意小說的現世性（worldliness），並理解小說與真實背景的複雜關聯，以突顯作為藝術作品的價值¹⁹。因古阿霞隨帕吉魯至花蓮而展開小說情節，又因旅行於台灣各地而觸及現世性主題，《邦查女孩》以林田山林場為小說場景，常以寫實手法記錄訪談與閱讀文獻所得，再現七〇年代伐木的景象。因日本人極喜歡台灣的檜木，日治時期常以之作為興建神社或住居室內高級家具的建材。戰後台灣森林的經營，基本上是承接日本殖民時代的投資與經營成果作基礎。除了殖民政府之外，民間的日商也經營林田山、木瓜山、望鄉山、香杉山、大元山、太魯閣大山、鹿場山等林場²⁰。1949年12月林產管理局所屬農林處改為農林廳，1960年2月林產管理局改制為林務局，仍隸屬於農林廳。原七山林管理所與七伐木林場合併成為十三林區管理處，在次級林務機構實施林務行政與林產管理之統合，國有林之經營使台灣林業進入另一階段²¹。小說中藉由振昌木業的創辦者孫海等故事，紀錄台灣山林史的滄桑²²。不僅多處批判林業政策的不當，舉出導致山林浩劫的例子；另一方面亦流露與山林親密的關係，分享體驗的自然書寫。自然書寫的建構，為拾掇自然界裡的各式對象，強調入境觀察，闡釋心靈體驗，輔以文學性建構，使自然更加活潑生動呈現於眼前²³。由田野訪談了解伐木的講究、禁忌，這些靠山吃飯的人對山林的看法，成為小

¹⁹ 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新北：立緒，2001年），頁47-49。

²⁰ 李久先、許秉翔，〈戰後台灣森林經營與遊憩之發展史〉，《林業研究季刊》32卷1期（2010年3月），頁88。

²¹ 李依陵、黃建中、何幸霖，〈林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林業檔案簡介〉，《台灣史研究》17卷2期（2011年6月），頁219。

²² 孫海（1917-1979）生於日治時期嘉義廳北港支廳尖山堡口湖莊，即現在的雲林縣口湖鄉港西村，「振昌木業」的創辦人。1958年標得林務局巒大山林場管理處所屬丹大林區5,000公頃伐木權，修建丹大林道建孫海橋。

²³ 關於自然書寫的定義，包括以「自然」與人的互動為描寫的主軸；注視、觀察、記錄、探究等「非虛構」的環境經驗，成為必要歷程。書寫自然界中的相關面向，大至宇宙洪荒，細觀蟲魚鳥獸，自然界本身為一座源源無竭的知識資料庫。吳明益，〈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台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0期（2010年4月），頁49。

說中主角古阿霞學習山林知識的內容。亦善用一些歷史人物如鹿野忠雄、大島正滿以及李光輝等人物傳奇，鋪陳故事的虛實。

小說中本名為劉政光的帕吉魯罹患難語症，指語言能力衰退或難以辨讀文字義理的病徵。一個人的語言發展是隨著社會經驗與累進思維慢慢型塑而成，會出現語言困難及阻礙的症狀，主因為大腦左半球管理語言的功能受到傷害，導致在言語表達、溝通認知和閱讀習得上，無法很順暢地呈現出來，或較邏輯的文法脈絡，出現跳躍，缺陷，漏洞的情形。造成帕吉魯此症的原因之一為祖父的教導方式，其背景因太平洋戰爭初期的需求，摩里沙卡的伐木進入高潮。為了保護森林，蔡明台的爸爸跟政府談條件，伐木需保存 48 林班地的水源森林，才能供給村民與工人生活。因此地屬於國家，地上物屬於蔡明台的爸爸，但在戰爭結束後被要求歸還。蔡明台的爸爸為保護扁柏森林，把森林便宜賣給了劉水木，因為劉水木是索馬師仔，他是誓死保護森林的人；但他也怕自己的意志不夠堅強，因此將地上所有權者給了當時還沒幾歲的劉政光，這樣至少還可以拖延到他 18 歲才有法律簽署的效力。但保留水源地這件美事在劉水木極端的教育下，害慘了劉政光，使得他難以融入人群，成為森林裡獨行的無語者（《邦查女孩》，頁 546-547）。《邦查女孩》重新建構對於台灣山林記憶，林田山林場這位不以電鋸的索馬師，以無語作為對欲奪取山林空間權力者的批判。

甘耀明運用七〇年代國際新聞與國內社會環境，台灣高山專業的知識，具臨場感的登山活動細節，以及高山的風勢、溫度與水氣變化，圓柏、箭竹與草被分布的描繪，以阿美族的植物知識，如野菜、藥草、樹種背後的民族文化意涵與實際作用。以「菊港山莊」為核心，舉凡林業發展史、開採的專業與設施裝備、林相的分佈與特質、個別樹種的特徵氣味、山林動植物的分佈與特性、從業人員的細分²⁴。小說描繪在森林火災現場「帕吉帶著古阿霞一起認識每棵木荷，抱每棵荷與消防員」（《邦查女孩》，頁 580）。木荷樹在烈焰下保護這群人物的生命，處處可見人與植物親密互動的生命書寫。森林於作家的筆下，常演奏生生不息的生命樂章。

²⁴ 巴代，〈《邦查女孩》讓我頓時成了「偽山人」〉，《聯合文學》第 368 期（2015 年 6 月），頁 72-73。

小說藉由古阿霞至玉里療養院的場景，敘述文老師遭遇之事，呈現白色恐怖時期荒謬、反諷的書寫。因帕吉魯希望拜訪吳天雄與文老師，古阿霞又隨之暫離林場，一起展開到玉里之旅。到花蓮才得知吳天雄已至玉里療養院治療，於是專程到療養院探望而認識「紅字」²⁵。眼見紅字長年處在遭惡劣對待的困境，所以古阿霞與帕吉魯又決定至台南找尋紅字的家人，協助他脫離療養院。玉里於戰後成為榮民療養院的地點，其形式與意義呈現意識型態及文化權力的軌跡。產生「創傷後壓力失調」(PTSD)的症候，主要取決於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與壓力是否轉變成創傷，創傷時間的長度，以及如何克服創傷所導致的能力失調等相關²⁶。戰爭暴力與政治動亂，其嚴重程度足以在任何地方瓦解人類的身心。竭盡感(exhaustion)主要來自於逃難或經常在面臨暴力和難以預期的傷害。被監禁在暗無天日、無法計日的窄小地方，其空間嚴重的限制身體的曲展；由於被斷絕公義和庇護，使得未來無可預期²⁷。《邦查女孩》所描述玉里療養院，多是一群戰亂後深受內心創傷者。例如吳天雄褪去衣物，劃開胸口，一綑綑撕下紋在胸口的「花蓮玉里 108 號」名牌，歎沒拔掉這肉牌子才苦，醒來又得愣頭愣腦被送回玉里。小說藉由人物批判：

他這輩子從這條賊船，跳到另一條賊船。不管共產黨、國民黨或玉里瘋人院都一樣，都是賊子、瘋子、傻子。(甘耀明，《邦查女孩》，頁 548-551)

就後現代而言，作為一種歷史情境，而非僅僅一時之時尚，必須尋求且加強後現代主義自身的批判因素²⁸。符號、文本、意象以及其他文化物事，於小說中時以剛烈的修辭，表達反諷的力道，形成另一種抗議話語。

²⁵ 甘耀明閱讀玉里療養院的資料，發現老兵許席圖的故事，即以他的生命歷程作為小說情節的來源。Kung cheng,〈小說獎 甘耀明〉,(來源：<https://youtu.be/9GyNJPiCvXE>, 2019年3月14日)。

²⁶ Lerner, Paul and Mark S. Micale, "Trauma, Psychiatry, and Histo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Traumatic Pasts: History, Psychiatry, and Trauma in the Modern Age, 187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7.

²⁷ 司徒琳、王成勉,〈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9期(2008年6月),頁1-16。

²⁸ 安德里亞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著,王曉珏、宋偉杰譯,《大分裂之後：現代主

帕吉魯原希望順道拜訪轉職任教於台南的文老師，然而文老師早已因伯父的牽連受到警總軍法處監視，再加上民眾檢舉，而以叛亂罪亡於槍下。許多生命儀式成立的要素，是因人的地位或身分的轉變，社會學家梵基尼（Arnold Van Gennep）將此命名為「通過禮儀」（rites of passage）²⁹。李豐楙認為台灣民間喪葬禮俗關心點在於「宇宙中此岸的時間如何在生命終止的過渡中，經由儀式後與彼岸順利地銜接，快速恢復時間的秩序；此岸的空間如何在生命變化後，與彼岸的空間聯結為一體而互有感應」³⁰。小說中描繪在多年後才進行的通過儀式，帕吉魯與一群學生相約至墓地：

當最後一批人聚過來時，他們拿鋤鏟挖墓，過程沒有上香丟筊等撿骨該有的儀式，讓帕吉魯覺得大家太急著要見到文老師的骨骸。挖到棺蓋，露出九芎樹根包裹的木柩，有人不小心鋤下一小片棺木，它瞬間流露了芬芳與美麗的裸木顏色，大家猛喊這就是文老師的味道呀。這時，帕吉魯的疑惑解開—棺木七年前埋下的時候做了極其繁複的防腐作業，不只用油布，外層還塗上柏油，葬在排水好的丘頂。他甚至想到，在棺柩尾沒有鑿開屍水孔『放栓』利通氣。這一切的目的是，防止屍骸腐爛。

（《邦查女孩》，頁 171-172）

帕吉魯與同學形成悼念的社群，年輕的社群成員未執著於傳統的撿骨儀式，不急於以「上香」儀式作為與逝去文老師溝通的媒介。藉由因旅行而至墓地的相聚，表達對老師的思念；又以棺木飄出芬芳，象徵對文老師的記憶，亦是與師生間的聯繫。大家異口同聲確認氣味，嗅覺意象成為同學彼此間的對話。小說中的文老師遭告密而突然消逝，為戒嚴時期白色恐怖下犧牲者的時代縮影；然而，小說不僅刻畫戰後中國移居來台的文老師形象，更藉由旅行中參與的通過儀式，流露老師與學生之間珍貴的情感。

義、大眾文化與後現代主義》（台北：麥田出版，2010年），頁 286-329。

²⁹ Van Gennep, Arnold,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trans.,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p. 1-14.

³⁰ 李豐楙，〈臺灣民間禮俗中的生死關懷〉，《哲學雜誌》第 8 期（1994 年 4 月），頁 32-52。

（二）生命敘事策略

《邦查女孩》透過文學的想像、修辭、結構，細緻地鋪陳人物的生命歷程，同理出更深刻的情感及意義，例如：林田山林場是古阿霞成長之旅的重要場景，在此她親身觀察到關於伐木師傅傷亡後的儀式，小說中提到：「邦查有個習俗，活著的人回到死者長年工作或生活之地，取得更多的慰藉，好獲得餘生更大的生存動力。」（《邦查女孩》，頁 368）伐木工的子女面對父親的傷逝，千里迢迢到林場悼念。死亡使人接觸到更深刻的成長經驗，這對姊弟旅行到父親長年工作場所，領悟到生命與林場的關聯性。又如在面對喪葬儀式的過程中，古阿霞本是相當抗拒與害怕，因擔心出錯或是造成無法彌補的悲劇；最後終於克服懼怕，而協助縫合伐木工大體傷口（《邦查女孩》，頁 309、364-369）。從接觸死亡到認識死亡，進而尊重生命而賦予生命新的意義。

甘耀明融入邦查的巨人阿里嘎該神話，藉此啟動帕吉魯的內在能量以及闡釋樹的心臟象徵意義³¹。《邦查女孩》提到山上化成精的巨木，小說中的森林不再是經濟產物的木材集中場，而是充滿生機的所在。後現代為一種形式與風格，在文學的書寫表達上，是省思現代主義而做的反動發展。小說描述索馬師仔（伐木工）如《莊子》所言「庖丁解牛」般神乎其技；遇意外而傷亡則彷彿如樹變形為巨人攻擊人類，象徵大自然的反撲，如此的敘事具後現代性。廖炳惠強調「心態上『質』的轉變，對統合而一貫的舊有哲學描述及歷史理解方式起了根本的質疑，並對這些大敘述底下的權力架構，以虛擬戲耍的修辭策略，析出其落差、謬誤及不具時效的面向」³²。此小說的後現代性又展現於潛意識的浮現和怪誕的想像，代替理性的秩序。如：《邦查女孩》巨樹踩人的素材：「巨樹確實會抬腳，卻沒有移動過，也不踩人。他們會踩，不過是踩在自己的媽媽身上。」、「媽媽最後腐爛了，不見了，身體印記卻留在孩子樹的身上。」又生動形容數十萬粒芝麻般的種子落下，只有母樹倒下後，那些落在母樹身上的種子才有足夠的

³¹ 在另一篇小說中，甘耀明提到針葉樹不論是斷枝、外傷或雷擊後會分泌樹脂包裹疤痕，防止細菌感染。歲月久遠，其中某道樹疤痕逐漸相近樹內，成為最堅硬之處。那是心臟，貯藏傷痕的倉庫。甘耀明，〈索馬星座〉，《短篇小說》第 2 期（2012 年 8 月），頁 90-101。

³² 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 年），頁 50-55。

陽光成長，根慢慢延伸到土地。小說藉由「隆起的樹根是母樹腐爛後的空缺，看起來像巨樹抬起的腳。」（《邦查女孩》，頁 477-478）象徵親子間從幼時的共生關係到成長後的獨立，雖然個體分離，孩子仍受惠於父母親所分享的養分；即使母親倒下，依然以另一個共生方式支撐孩子。此處挪用巨樹的故事，闡發母愛的生命力。

小說中〈天使的父母〉一節亦提到親子關係的故事，多是生命的映照。

天使們的努力學習付出，感動了上帝，答應讓牠們到人間。上帝說，人間苦難極多，祢們的心志強還是不夠用，需要比一般人更強的父母。因為祢們多受一份苦難，你們的父母會承受兩倍的苦難。我為祢們選擇人世間最堅強的父母保護祢們，好了，我的小天使們，下去凡間吧！（《邦查女孩》，頁 389）

上帝為小天使安排堅強的雙親，在徬徨無助時，家是永遠的避風港；不論遇及任何困難，父母親終其一生關愛孩子，是永遠的情感的支柱。關於天使的樣貌，並非是完美的模型，而是透過更多苦難與煎熬，使自己變得更加茁壯，象徵現代少年的生命潛力。另一生命書寫的例子，如早田文藏忙於歸類植物時，忽略了次女日漸惡化的疾病，他將次女送醫時，因路程顛簸而離世。他在第一次看見台灣杉時，希望孩子們能歷經災難，也屹立不搖。然而次女卻在他懷中去世了。葬禮過後，他連拍了幾封電報回日本，要求將台灣杉的英文學名改成次女的名字 Kiyoko——潔子，意謂純淨的孩子。然而論文已印刷完畢，他只能在往後出版的《臺灣植物圖譜》，以一種無人理解的手法將台灣杉改成潔子樹，但未獲植物學界的認可。早田文藏將自己的「創傷」投射到專業領域上，欲以命名消解內心的苦痛。

又因古阿霞與帕吉魯至七星潭，而觸發古阿霞編故事，敘說有關「瑪大藍」的素材，一位母親悲傷地向海神乞求救活因捕魚而溺死的兒子。海神動搖而告訴她，每個海灘上的石頭都代表一個人，如果能找出兒子的生命石便能救他。媽媽日夜不斷的尋找，親吻每個石頭，因她知道兒子的體溫。最後，她的手指如海星般，能一次抓十顆石頭，就要抓到兒子的生命石時，海神不願違反死而

復生的自然法則，捲起一波浪濤，打亂了海灘上的石頭。母親悲憤地想投海自盡，在投海之際，海灘傳來千千萬萬喊「伊－娜」的聲音。母親回頭一看發現無數的石頭化身成孩子大喊媽媽。因而擁有許多頑皮愛滾動的石頭小孩，她在海岸搭起茅屋，陪伴小孩，日日看海，她的眼瞳才映入了瑪大藍³³。敘事心理學者 Michele L. Crossley 認為「所受的傷害也會變成能量的泉源。」³⁴敘事的海神藉由石頭給予母親希望、再使她絕望，到最後使她重生，如此轉折構成敘事的張力。海邊原為傷心之處，但因創傷轉移到更廣闊的對象，海邊這個空間反而成為其再生的生命泉源之處。長期陪伴與深情的付出，瑪大藍成為其生命史上再次獲得能量的印記。生命書寫著重於如何面對親人離去後的創傷，是一種困境也是轉變的契機。《邦查女孩》以痛失親人卻從他處得到救贖的素材，為正向面對創傷的生命書寫。

班雅明認為以往口耳相傳的經驗傳承是本能，作為後世子孫鑑往知來，引為借鏡。在近代印刷術發明之後發展成小說，因虛構的本質，以奇巧華麗、天馬行空，各種方式展現藝術面貌。敘事飽藏濃縮的力量，而且誕生多時之後仍保有燦爛開放的能力。非以如實呈現的方式認識過去，而是去體驗於讀者與說故事的人之間所形成的辨證張力³⁵。後現代知識可提高對差異的敏感性，其根本精神是對於現代性的批判、質疑和否定。而所謂的「批判」，是針對由「主體」的膨脹所擴張的權力，尤其是認為當道的言說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其預設了權力。它的「質疑」是針對「表象」，而對於表象的質疑在於它失去了原本的依據，轉變成為「擬象」(simulacre)。後現代的「否定」是針對「理性」的統合作用與理性的邏輯，排除真假對立，而走向尊重多元、雜然並陳的情形³⁶。《邦查女

³³ 筆者以通信請教甘耀明所得，訪問時間 2016 年 11 月 14 日。他告知藍眼瞳的想法來自泰雅族，是他當記者時在苗栗泰安鄉所見，那裡的人不少眼睛有藍眼圈。他閱讀苗栗泰安鄉出版的紋面國寶專輯，泰雅族紋面老人的照片裡面有很清楚的藍眼瞳，並非疾病所致。

³⁴ 克羅斯萊 (Michele L. Crossley) 著，朱儀羚等譯，《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濤石文化，2004 年)，頁 204。

³⁵ 華特·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台北：臺灣攝影，1998 年)，頁 8-32。

³⁶ 李歐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著，車槿山譯，《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台北：五南，2012 年)，頁 24-26；沈清松，〈在批判、質疑與否定之後——後現代的正面價值與視野〉，《哲學與文化》27 卷 8 期 (2000 年 8 月)，頁 707。

孩》於素材的再現方式，以後現代的混搭、拼裝、挪用、雜揉等美學手法，試圖解構漢人為中心的論述。利用想像將素材通俗化，又以文學意象加以精緻化而詮釋生命。文學的閱讀因而與生命核心的探究連接，以深化對生命本質的意義而產生同理心。

李有成論及生命書寫時，主張個人的「個性」將「成為更大的紛擾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結構與力量的一部分。」³⁷以區隔生命書寫及自我書寫的概念，認為生命書寫不侷限在自傳的文類，而是可擴及到其它文體的範疇。許多生命書寫的故事，隱喻面對生命的態度，如小說中古阿霞本欲陪伴王佩芬至花蓮市墮胎，遇及四位原住民抬著躺在床板上的難產婦女，卻屢遭漠視，於古阿霞熱心協助下才得以就醫。原住民以傳統的習俗祈福：「買了塊豬肉當作祈福牲禮，手指沾米酒彈灑，祈求祖靈保佑眼前苦難的女人平安回到部落，以及慰藉死去的嬰兒。」又以德魯固族傳統的織衣，披在古阿霞身上，說：「請披上有都烏利葛·烏度戌（dowriq utux）的布吧！妳是我們山地人的好朋友了。」（《邦查女孩》，頁 502）從毫不相識到與原住民成為好友，此為人際關係與互動的友誼，回饋以織滿菱形紋狀祖靈之眼的族群衣飾。後來因見到前位手術後空顱的死嬰，陪同王佩芬至醫院的古阿霞祈求阿美族與賽德克的祖靈保佑，王佩芬因腹中四個月的嬰兒大力震動，而改變墮胎的決定。

生命書寫的倫理在於如何讓生命擺脫自我的狹窄視域，將之置入群體或集體的關係脈絡中審視和理解。甚至生命書寫極度仰賴的記憶，雖然自個體出發，但是由於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最後仍不免被視為社會的建構，個人的記憶因此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不管是自傳式的「我」，或是出諸於小說、遊記形式的第三人稱的說話人，生命書寫所觸及的生命核心價值，乃至於人生的衝突、創傷、離散或戰爭經驗等皆值得深思³⁸。當小說中的人物旅行至中央山脈的七彩湖後，帕吉魯又行進至七彩湖南方六順山，因感冒而引發嚴重的高山症。古阿霞講述幼時慘痛經歷的記憶片段，說出這些創傷只為喚醒昏迷且生命垂

³⁷ 李有成，〈回家—論林玉玲的回憶錄〉，《英美文學評論》第 17 期（2010 年 12 月），頁 198。

³⁸ 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台北：中研院歐美所，2011 年），頁 8-16。紀元文，〈再思生命書寫中的「脆弱主體」：專號緒論〉，《歐美研究》38 卷 3 期（2008 年 9 月），頁 368。

危的帕吉魯。趙天民制止古阿霞七次，連旁人多不忍聽聞其故事，但她仍繼續訴說這悲苦的人生經歷，而引發趙天民讚美及佩服。作者揣摩古阿霞的心理掙扎與糾葛：「努力遺忘的過去又回來，她努力不被自己的困頓、膽怯與悲哀阻礙」（《邦查女孩》，頁 561）。記憶是對於過去不斷的梳理，古阿霞面對自己的生命故事，於重構記憶的過程中成長。

除了親近山林的描寫之外，此小說聚焦於自然環境生生不息的多樣性以及人與自然生態的互動；同時觸及生命本質的思考、價值的抉擇及態度等面向。豪斯（Craig Howes）認為生命書寫不復局限於傳統自傳、傳記所表述的生命歷史或經驗的記載，而是具有更寬廣的彈性涵納文本中所建構的現實³⁹。以生命論述作為主題，超越了文類的範疇，討論生命書寫中「轉生」與新生的可能⁴⁰。生命書寫從面對生命經驗開始，進而在整理與摸索的過程中覺察、解釋、建構與統整自身的生命，個體生命經驗在書寫當中浮現新的情感與意義，藉此再回到現實生活時，個體本身也因此有新的動力，得以再去實踐⁴¹。甘耀明曾觀摩全人學校導入美國家族治療學派之一的薩提爾模式，以融入諮商與輔導觸動學生的個人內在，使青少年感到被接納、有價值、自由、愛與被愛，冰山隱喻深埋感受、觀點、期待，以及渴望，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擴大成長取向的學習歷程⁴²。《邦查女孩》中的文老師對於帕吉魯的耐心與愛心，使他找回內在深層連結、見到隱藏的動力，成為自我改變的重要契機。另一例為命運坎坷多舛的古阿霞，真情流露絮絮叨叨，終於從鬼門關將帕吉魯救回的情節，亦是詮釋生命意義的敘事。

四、結語

成長小說蘊含學習的心路歷程，其意義存在於人生的衝突、創傷中，面對自我或遭逢他者挑戰的不斷試煉。甘耀明《邦查女孩》以旅行敘事及故事轉化

³⁹ Howes, Craig, "Afterward",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New York: Cornell UP, 2004), pp. 244-264.

⁴⁰ 馮品佳，〈生命／書寫〉，《英美文學評論》第 15 期（2009 年 12 月），頁 V。

⁴¹ 李振弘，〈認識論就是生命史：一個寫作者對「生命書寫旨趣」的自我敘說〉，《輔導季刊》51 卷 1 期（2015 年 3 月），頁 20-21。

⁴² 約翰·貝曼（John Banmen）著，江麗美、魯宓譯，《薩提爾成長模式的應用》（台北：心靈工坊，2008 年），頁 1-2。

至小說的情節中，表達對成長的詮釋。不僅鋪陳古阿霞與帕吉魯等人物生命的能量，亦視樹木、動物為有情，且於集體的關係脈絡中理解生命。閱讀長篇小說為理解時代情感結構的途徑之一，《邦查女孩》描繪古阿霞於旅途中所遇及的各種人物形象，隱含作者對於歷史的詮釋。例如以難語症象徵台灣人的失聲、失語狀態，啞口無言反能揭穿許多虛假。甚至以文老師象徵於白色恐怖年代知識分子的冤屈，又以玉里療養院吳天雄等人物群像，隱喻戰亂後走過苦難的人物困境，以及時代的荒謬性。

甘耀明透過走訪摩里沙卡的田野現場及閱讀文獻，鋪陳 1970 年代中央山脈的伐木景象；又藉由想像及反諷，詮釋生命的核心價值。以挪用阿美族巨人阿里嘎該的神話、巨樹及瑪大藍的素材，或運用混搭、雜揉的手法；並拼貼鹿野忠雄、大島正滿的經歷。小說中的兩位主角則在旅行的過程中成長，共同尋找生命的存在價值。古阿霞於旅程中聆聽各類人物面對生命情境的抉擇，或試圖轉移喪子之痛、或友朋山難等自責的創傷，生者彷彿如歷經通過儀式，而重新積極正向面對生活。本文從旅遊動機與路線、旅行與生命敘事兩層面，探討小說敘事如何詮釋追尋生命意義的主題。

《邦查女孩》轉化神話、故事及習俗，時而經由想像、重組、拆解、編織、裁接的後現代手法，運用於文本的情節。雖為虛構小說，但其靈感來自作者的個人記憶，許多場景與他的生命歷程有所關聯。登山使他對山林產生真實的感受，而非圖片或文字傳達之樣貌；訪談山林工作者而體驗自然與人類的互動，並獲得山林第一手的實務資訊。並置一些歷史人物於情節之中，扣合時代的脈絡以鋪陳小說的寫實性，使個人記憶亦融合於社會記憶中。透過文學的修辭及情節安排，更完整細緻呈現人物的生命史，同理出更深刻的生命情感。甘耀明選擇林場作為小說的空間，象徵生生不息的自然場域，森林為台灣自然環境的核心，從這裡開始連結既有記憶，建構小說人物的生命經驗，以傳達出其對生命本質的思考及態度等面向。藉由旅行述說生命的成長經驗，將體悟的記憶分享，與讀者建立情感的連結。

生命教育包含終極關懷與實踐、倫理思考與反省、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互相關聯的三領域，必須統合觀之才構成完整的生命教育⁴³。正向心理學注重正面積極思考，強調正向情緒、特質，渴望找出自己的長處，以自我實現為終極目標。甘耀明所型塑古阿霞這位邦查女孩，具正向心理的人格特質，當遇及挫折時積極解決問題，並嘗試改變思路以迎向未來。又運用旅行象徵未知與冒險，為生命帶來更新的機會。旅行與成長密切相關，須冒某種程度的風險，於挑戰中自我砥礪，才能到達彼岸。古阿霞的成長之旅，不僅自我療癒，亦超越自我、療癒他人。透過成長小說傳達能量，藉由索馬師仔的自我述說，隱含批判不當的林業政策。《邦查女孩》以文學手法，連結原漢之間的對話鴻溝，隱喻自然與人的相處之道，以及實踐生命的永恆意義，深具生命教育的意涵。

⁴³ 孫效智，〈當前台灣社會的重大生命課題與願景〉，《哲學與文化》31卷9期（2004年9月），頁14。

主要參引文獻

一、專書

- 山本三生編，《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日本：改造，1930年）。
- 甘耀明，《邦查女孩》（台北：寶瓶文化，2015年）。
- 甘耀明，《神秘列車》（台北：寶瓶文化，2003年）。
- 安德里亞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著，王曉珏、宋偉杰譯，《大分裂之後：現代主義、大眾文化與後現代主義》（台北：麥田，2010年）。
- 克羅斯萊（Michele L. Crossley）著，朱儀玲等譯，《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濤石文化，2004年）。
- 李崇建、甘耀明，《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台北：寶瓶文化，2004年）。
-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著，車槿山譯，《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台北：五南，2012年）。
- 周芬伶，《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像（1945-2006）》（台北：印刻，2007年）。
- 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台北：中研院歐美所，2011年）。
- 約翰·貝曼（John Banmen）著，江麗美、魯宓譯，《薩提爾成長模式的應用》（台北：心靈工坊，2008年）。
-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年）。
-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台北：玉山社，2000年）。
-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台北：臺灣攝影，1998年）。
- 廖炳惠，《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年）。
- 管仁健，《你不知道的台灣國軍故事》（台北：文經社，2011年）。

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新北：立緒，2001年)。

Abrams, M.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Van Gennep, Arnold, translated by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Howes, Craig. "Afterward,"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New York: Cornell UP, 2004).

Lerner, Paul and Mark S. Micale, "Trauma, Psychiatry, and Histo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Traumatic Pasts: History, Psychiatry, and Trauma in the Modern Age, 187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P, 1997).

二、論文

司徒琳、王成勉，〈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9期(2008年6月)，頁1-16。

石計生，〈印象空間的涉事——以班雅明的方法論楊牧詩〉，《中外文學》31卷8期(2003年1月)，頁234-252。

吳明益，〈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台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0期(2010年4月)，頁45-79。

李久先、許秉翔，〈戰後台灣森林經營與遊憩之發展史〉，《林業研究季刊》32卷1期(2010年3月)，頁87-96。

李有成，〈回家——論林玉玲的回憶錄〉，《英美文學評論》第17期(2010年12月)，頁193-208。

李依陵、黃建中、何幸霖，〈林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林業檔案簡介〉，《台灣史研究》17卷2期(2011年6月)，頁213-241。

- 李振弘，〈認識論就是生命史：一個寫作者對「生命書寫旨趣」的自我敘說〉，《輔導季刊》51卷1期（2015年3月），頁19-28。
- 李豐楙，〈臺灣民間禮俗中的生死關懷〉，《哲學雜誌》第8期（1994年4月），頁32-53。
- 沈清松，〈在批判、質疑與否定之後——後現代的正面價值與視野〉，《哲學與文化》27卷8期（2000年8月），頁705-716。
- 紀元文，〈再思生命書寫中的「脆弱主體」：專號緒論〉，《歐美研究》38卷3期（2008年9月），頁363-376。
- 孫效智，〈當前台灣社會的重大生命課題與願景〉，《哲學與文化》31卷9期（2004年9月），頁3-20。
- 高嘉勵，〈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行旅書寫——日治時期「自然」的現代知識建構與美學表現〉，《中外文學》45卷1期（2016年3月），頁119-165。
- 陳惠齡，〈空間圖式化的隱喻性——台灣「新鄉土」小說中的地域書寫美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2009年10月），頁129-161。
- 游惠瑜，〈生命議題的倫理思考〉，《哲學與文化》32卷6期（2005年9月），頁89-108。
- 馮品佳，〈生命／書寫〉，《英美文學評論》第15期（2009年12月），頁V-Vii。
- 鄭文惠，〈「空間與生命書寫」專題導言〉，《政大中文學報》第2期（2004年12月），頁1-2。
- 薛鈞洪，〈族群、性別與生態：《邦查女孩》動植物意象分析〉（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7年）。
- 羅光，〈倫理道德和生命〉，《哲學與文化》18卷9期（1991年9月），頁770-776。
- 蘇榕，〈死亡 | 轉生：古雷希的生命書寫〉，《英美文學評論》第15期（2009年12月），頁1-38。

三、雜誌文章

巴代，〈《邦查女孩》讓我頓時成了「偽山地人」〉，《聯合文學》第 368 期（2015 年 6 月），頁 72-73。

甘耀明，〈索馬星座〉，《短篇小說》第 2 期（2012 年 8 月），頁 90-101。

朱宥勳，〈接近無限的純真：讀甘耀明《邦查女孩》〉，《聯合文學》第 368 期（2015 年 6 月），頁 74-75。

郝譽翔，〈新鄉土小說的誕生：解讀六年級小說家〉，《文訊》第 230 期（2004 年 12 月），頁 25-42。

四、電子媒體

Kungfu cheng，〈小說獎 甘耀明〉，（來源：<https://youtu.be/9GyNJPiCvXE>，2019 年 3 月 14 日）。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台灣瑰寶—櫻花鉤吻鮭的家」，〈台灣櫻花鉤吻鮭一波三折的命名過程〉，（來源：<http://life.nthu.edu.tw/~labtcs/Salmon/>，2019 年 5 月 20 日）。

